

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 居民的社会流动

——对武汉市、杭州市2766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

陈恢忠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 居民的社会流动

——对武汉市、杭州市2766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

陈恢忠 等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对武汉市、杭州市
2766 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 / 陈恢忠等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5161-1614-2

I. ①市… II. ①陈… III. ①市民—社会流动—调查
研究—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1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舒志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市场过渡、家庭背景与地位资源分配	(1)
第二章	市场过渡期中国大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致中的 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	(49)
第三章	市场过渡期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影响的消长.....	(65)
第四章	市场过渡期家庭背景对个人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的影响	(82)
第五章	市场过渡期城市居民男女收入差距的现状 及其原因分析	(99)
第六章	市场过渡期武汉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142)
第七章	市场过渡期杭州市居民家庭背景与个人职业 地位关系研究	(168)
附录：	武汉市居民职业与流动情况调查问卷	(203)
后记		(216)

第一章 市场过渡、家庭背景与 地位资源分配

一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地位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由于社会结构通常不是扁平的，因此，社会地位会有高低之分，即使是没有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也能够感觉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存在着差别。

社会地位在人们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呢？为什么有的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有的人只获得了较低的社会地位呢？一般的讲，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通常是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历史机遇、个人先赋因素与个人自致因素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的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时在研究结论上甚至完全相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对个人社会地位（主要指个人阶级地位）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消费完工资之后还得继续出卖劳动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受压迫、受剥削、受监督永远贫穷的社会地位；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通过获得利润的方式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这样，资本家就会越来越富有，就可以继续雇佣越来越多的劳

动力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他们的管理者、监督者、财富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再生产，而且还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①

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马丁在他的《权力社会学》一书中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在1900年到1972年，只有百分之一的公司领导人是来源于工人阶级背景，百分之三来源于小业主，而百分之六十六则是来源于上层阶级（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大财产占有者）。”^②

法国学者布迪厄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不过其分析角度与马克思不同，他是从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传递，精英家庭一般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通过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再生产，其子代就可以在社会竞争中复制其父辈的精英地位。^③

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与上述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个人能力和努力，父母因素虽然对个人职业地位有影响，但只能解释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20%左右，换言之，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还有80%左右的部分不能由父母因素来解释。^④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要用计划管理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这种条件下的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陈婴婴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与中国城乡

① 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4—90页。

② 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丰子义、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07页。

③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3页。

④ 许嘉道：《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有关,农民由于户籍的限制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即使他们能力与学历与干部、工人一样,也不能获得干部与工人一样的收入。^①郭书田、刘纯彬在《失衡的中国》一书中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据,他们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工人阶层在收入水平、住房分配、医疗保障、退休养老、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等诸多方面都优于农民阶层,从而形成了工人与农民社会地位的客观差距。^②

边燕杰等从社会网角度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问题,认为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有价值的信息由计划管理部门收集、垄断和分配,求职者只是被动接受挑选,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经济中社会网在个人求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再分配部门官员关系好就可以得到优先照顾,关系一般可照顾可不照顾,没有关系则不被关照,这样,个人最后的社会地位获得就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③

与以上观点不同,李强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与个人出身(个人阶级成分)密切相关。“首先,家庭出身会影响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家庭出身好与不好是当时录取大学生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其次,家庭出身会影响一个人的就业机会。……组织在安排就业时非常注重家庭出身。再次,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出身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当时人们都很追求的参军、入党等,而家庭出身往往起决定性作用”。^④

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活力,严重地妨碍了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在

① 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5页。

③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④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传统的计划经济内部，逐渐引入一些市场因素，1992 年中共中央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从此，中国就进入到一个两种体制并存，计划因素逐渐减少，市场因素逐渐增多的社会转型期。

毫无疑问，市场过渡环境是一个既不同于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也不同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环境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个人怎样去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的利益格局会受到何种冲击这都是人们十分关心和想搞清楚的问题。本章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二）关于市场过渡的理论研究

市场过渡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规则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因素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发挥作用后，人们上岗要竞争了，企业可以自主招聘员工了，也可以把计划外产品拿到市场上按市价出售了，劳动者也可以自谋生路、自主创业了，这种规则的变化会给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思考和研究。

概括地讲到目前为止，关于市场过渡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

1. 精英轮换论的观点

精英轮换论的核心观点是计划时期的社会精英在市场过渡期由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会被一批新的社会精英所代替，市场化改革中得益的是计划经济时期被压抑的社会阶层，利益相对受损的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瑟伦伊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

瑟伦伊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被中断，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精英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被抑制，市场化改革

使这些国家被中断了的资本主义进程得以继续,那些前资本主义精英或是因为他们对市场规则的熟练曾经在市场环境中如鱼得水,或是借助于文化的传承以及他们对于前资本主义的记忆,使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市场过渡环境、获得先机,从而通过市场活动重新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精英地位。瑟伦伊通过其对匈牙利农场主的调查证实了自己的分析,他发现农场主的收入与他们家庭在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经营规模正相关^①。

2. 精英重组论的观点

精英重组论的核心观点是市场过渡期直接生产者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国家行政官员的利益则相对受损。社会分层的系列会出现变化,社会的最高收入层不再由计划时期的再分配官员(或者说国家的行政管理干部)所独占,而是会出现重组,维克多·倪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

维克多·倪认为市场过渡会带来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1)控制资源的权力由再分配部门向市场转移,直接生产者权力扩大,再分配官员权力缩小,由此引起双方利益关系变化。(2)出现了新的向上流动机会,直接生产者可以通过其市场活动而成为企业家,这是一个可以与干部地位相媲美社会地位。(3)市场对直接生产者的激励更有效,多劳多得可以使直接生产者截留更多的剩余在自己手中。这三大变化都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这是造成传统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②。

维克多·倪通过其在中国厦门郊县所做的农户调查证实了自己的上述理论分析,他发现干部收入虽然不低于一般劳动者,但不及做生意的人的收入高,另外,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及家庭结构之后,

^① [匈牙利] 罗纳塔斯:《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还可参见原文: Szelenyi, Ivan,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② [美] 维克多·倪:《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

行政职位的报酬在统计上并未显示出显著性来^①。

3. 权力继续论的观点

权力继续论主要强调干部阶层在市场过渡期仍然能继续保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但不同的学者论证角度有一些差异。

边燕杰等主要从社会网在个人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角度去论证权力继续问题。边燕杰等认为“虽然市场化是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但并不表明政治权力对资源的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将会削弱，相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公共和其他重要物品生产和流通的国家垄断，单位制在盈利企业和事业组织中的巩固、地方社团主义上升，以及党对人事任免的决策作用都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继续……在转型经济中。经济实体的代理人作为雇主，将继续向求职者送人情”（边燕杰，2001）。边燕杰通过分析其在天津所做的调查资料发现，同无职务的关系人相比，国企经理更可能向求职者提供人情，其次，在转型时代，中央和省市部门的关系人更可能向求职者提供人情和信息，从而证实了自己的假设^②。

施耐等人从技术的角度论述权力继续的问题。他们认为，再分配体制下的党员干部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在市场过渡期，这些人能够凭借其专业技能维持住其以往的优势地位，因为一般认为企业家位置所需的道德和技术素养与行政官员职位所需要的道德和技术素养无本质差异，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在再分配时代还是在市场过渡期，教育都有正回报，这是权力继续的有力证据^③。

还有一种权力继续论的观点认为，人是机动灵活的，不是机械

① [美] 维克多·倪：《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

②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③ Szalai, Erhsebet, *Gazdasag es hatalom (Economy and power)*, Budapest: Aula, 1990.

的，他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不会看着自己地位的衰落而无动于衷，在市场过渡期国家公职人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好处，他们或贪污、或受贿、或变着法儿把国有资产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的家人或亲戚朋友在市场竞争中提供便利等等，通过这些努力，他们就可以继续维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斯坦尼基斯（Staniszkis）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①。

（三）研究思路与设计

1. 研究思路

由于市场过渡理论主要由国外学者提出，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也很不充分，本研究将围绕市场过渡理论争论的三大主题：（1）市场过渡期干部阶层是被再生产还是被重组，他们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失；（2）市场过渡期是否存在低地位群体机会补偿问题，市场过渡是否会导致社会平等化的出现；（3）社会的阶层利益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社会的分层系列是否由此发生改变而展开全面的检验，重点考察职位资源、政治权力资源、经济地位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配情况，以及他们是依靠什么获得这些资源的，从而达到厘清问题的目的。

2. 主要概念

—（1）市场过渡。市场过渡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其特点是国家开始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改革，逐渐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内部引入一些市场因素，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占主导地位，但目标还未完全达到。二是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二者密不可分。中国的市场过渡起始于1978年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到目前为止，由于我

^① Staniszkis, Jaduiga, *The Dynamics of the Breakthrough in Eastern Europe: The polish Experi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国的市场制度仍处于完善之中，因此，从1978年到现在为止都可以称之为市场过渡期。

(2) 家庭背景。家庭是指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社会基本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家庭背景是指个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用个人父母的有关情况如职业、教育、收入、行政职务、政治面貌等来指代个人的家庭背景。

(3) 职业地位与社会分层。职业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由于每一种工作在收入、权力、社会评价上不尽相同，所以职业又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本研究中，我们参考以往学者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以及陆学艺^①、边燕杰、李路路^②等学者的分层标准及方法，将城市居民按职业分为五个社会阶层：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自雇佣者阶层、工人阶层，并以此作为分析社会流动的基本框架。

3. 抽样与资料收集

城市的选择：本研究主要是研究大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情况，因此，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事先就排除了大城市以外的农村居民以及小城镇居民，在城市的选择上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就选择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杭州市，一个是武汉市。杭州市地处沿海，私营个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市场发育比内地大城市要成熟，代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武汉市地处中原内陆，改革开放比沿海城市稍慢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多，个体私营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与沿海城市相比（特别是与江浙、广东一带的城市相比），明显要落后许多，代表市场发展较慢、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大城市。选择这两个大城市作研究主要是想探讨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大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会造成何种影响。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抽样方法：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择样本。第一步在两个城市随机抽取若干个街道，第二步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若干个社区，第三步在每个社区按等距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若干个家庭。然后在每个家庭随机访问一位 1980 年以后参加工作或是达到了就业年龄暂时处于失业、下岗、待业状态的家庭成员，用这种方法在两个大城市一共抽出了 3000 位符合研究需要的调查对象。实际完成有效调查问卷 2766 份，其中武汉市 1539 份，杭州市 1227 份。

资料收集方法：本次调查采用结构式问卷访谈法收集调查资料，先由课题负责人及相关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设计调查问卷，然后由调查人员带着调查问卷入户访问。文化程度较高的访谈对象由他们自己填写问卷，访问员现场收回问卷；文化程度较低的调查对象，由访谈员按问卷的问题提问，并告知共有几个答案供他们选择。待访问对象作出选择后，访问员再在他们选定的答案上打钩。

为保证调查质量，尽可能减少调查误差，我们努力寻求相关社区居委会的支持，让他们带着我们的调查员入户访问。同时要求访问员佩戴校徽（访问员均由大学高年级本科生承担），戴上课题组为访问员专门定制的访问员牌子，同时还要求他们带上学生证以备调查对象随时验证身份。所有调查都是匿名的，同时在问卷问题的排序上也下了一些工夫，目的就是努力打消访谈对象的种种顾虑，配合我们的调查。

武汉市的调查于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1 月份完成，杭州市的调查于 2003 年 7 月份完成。全部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工作都是在电脑上运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辅助完成。

二 大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分析

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按社会流动的方向分类，社会流动被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大类；按社会流动的参照点分类，社会流动被分为代际流动和

代内流动两大类。

代际流动的参照点是父亲的职业地位，主要是比较子代与父代之间的地位差异，代内流动的参照点是个人的初职地位，主要是比较个人现职地位与初职地位之间的差异。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分析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情况。

(一) 流出率分析

1. 市场过渡期各社会阶层的流出率

流出率以父亲职业为基数进行计算，主要考察子女的职业与父亲职业的背离程度。表 1—1 的数据是市场过渡期大城市居民职业流动的总体情况。

表 1—1 大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全部样本流出率）

父亲职业	本人职业					
	工人	自雇佣者	职员	专业技术人员	干部	总计
工人	311/29.5	289/27.4	197/18.7	193/18.3	66/6.3	1056/100
自雇佣者	37/19.2	67/34.7	52/26.9	30/15.5	7/3.6	193/100
职员	29/13.3	45/20.6	80/36.7	44/20.2	20/9.2	218/100
专业技术人员	42/13.3	37/11.7	70/22.2	140/44.4	26/8.3	315/100
干部	55/16.1	45/13.2	73/21.3	105/30.7	64/18.7	342/100
总计	474/22.3	483/22.7	472/22.2	512/24.1	183/8.6	2124/100

Chi-square 值 267.377 df 16 sig (2-side) .000

从表 1—1 可以看出，市场过渡期大城市居民社会流动具有以下特点：

(1) 在 5 大社会阶层中，工人阶层的继承率为 29.5%，流出率为 70.5%，自雇佣者阶层的继承率为 34.7%，流出率为 65.3%，职员阶层的继承率为 36.7%，流出率为 63.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继承率为 44.4%，流出率为 55.6%，干部阶层的继承率为

18.7%，流出率为 81.3%。流出率最高的是干部阶层，即干部子女中有 81.3% 的人不再从事与父亲一样的职业，其次是工人阶层，工人的子女中有 70.5% 的人不再从事与父亲一样的职业；继承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女中有 44.4% 的人从事与父亲一样的职业，其次是职员阶层，他们的子女中有 36.7% 的人从事与父亲一样的职业。

(2) 在全部样本中（指在职人员），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人（即个人职位比父亲职位高）为 924 人，占样本总数的 43.5%，向下流动的人员为 638 人，占样本总数的 30.04%，地位没有变动的人数为 662 人，占样本总数的 31.17%，在全部样本中，向上流动的人数比向下流动的人数多出 13.46 个百分点，即总的来说，在市场过渡期受益的人数比例高于利益受损失的人数比例。

(3)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越是处于社会分层体系下端的社会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其子女向上流动的比例越大，越是处于社会分层体系上端的社会阶层，其子女向下流动的比例越大，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市场化改革给下端社会阶层子女带来了更多机会。

2. 流出率的城市差异

现在我们比较武汉市与杭州市的流出率情况。

表 1—2 的数据反映的是武汉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情况，表 1—3 的数据反映的是杭州市居民的社会流动状况，从内陆到沿海，市场过渡期的城市居民社会流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表 1—2 武汉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流出率）

父亲职业	本人职业					
	工人	自雇佣者	职员	专业技术人员	干部	总计
工人	217/37.6	120/20.8	89/15.4	112/19.4	39/6.8	577/100
自雇佣者	21/30.9	13/19.1	20/29.4	13/19.1	1/1.5	68/100

续表

父亲职业	本人职业					
	工人	自雇佣者	职员	专业技术人员	干部	总计
职员	15/15	13/13	38/38	26/26	8/8	100/100
专业技术人员	30/15.3	17/8.7	34/17.3	104/53.1	11/5.6	196/100
干部	41/20.8	14/7.1	32/16.2	76/38.6	34/17.3	197/100
总计	324/28.5	177/15.6	213/18.7	331/29.1	93/8.2	1138/100

Chi-square 值 186.488 df 16 sig (2-side) .000

表 1—3 杭州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流出率）

父亲职业	本人职业					
	工人	自雇佣者	职员	专业技术人员	干部	总计
工人	94/19.6	169/35.3	108/22.5	81/16.9	27/5.6	479/100
自雇佣者	16/12.8	54/43.2	32/25.6	17/13.6	6/4.8	125/100
职员	14/11.9	32/27.1	42/35.6	18/15.3	12/10.2	118/100
专业技术人员	12/10.1	20/16.8	36/30.3	36/30.3	15/12.6	119/100
干部	14/9.7	31/21.4	41/28.3	29/20	30/20.7	145/100
总计	150/15.2	306/31	259/26.3	181/18.4	90/9.1	986/100

(1) 工人阶层代际流动变化情况。在武汉市（见表 1—2），工人子女继承父亲职业的人数比例为 37.6%，在杭州市（见表 1—3），这一数据下降为 19.6%，即从内地到沿海，工人阶层子女向上流动率增加了；在武汉市，工人阶层子女从事自雇佣者职业的占工人阶层子女人数的 20.8%，在杭州市这一数据上升为 35.3%；在武汉市，工人阶层子女从事职员职业的人数占工人阶层子女人数的 15.4%，在杭州市这一数据上升为 22.5%。而在专业技术人员与干部两个职业中，从武汉市到杭州市工人阶层子女的人数分布比例均略有下降。

(2) 自雇佣者阶层的代际流动变化情况。在武汉市, 自雇佣者阶层继承率为 19.1%, 流出率为 80.9%, 其中向下流动约 31%, 向上流动约 50%, 在杭州市, 自雇佣者阶层继承率为 43.2%, 流出率为 56.8%, 其中向下流动率为 12.8%, 比武汉市下降了许多, 向上流动率为 44%, 同样也比武汉下降了许多。由此可见, 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自雇佣者阶层的代际流动有一种向自身收敛的态势, 这表明他们对自身状态的满意与认同, 对其他职位的追求兴趣下降, 而更多的是巩固和加强自身已经获得了的职业地位。

(3) 职员阶层的代际流动变化。在武汉市, 职员阶层继承率为 38%, 向下流动率为 28%, 向上流动率为 34%; 在杭州市, 职员阶层的继承率为 35.6%, 向下流动率为 39%, 比武汉市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 向上流动率为 25.5%, 比武汉市下降了 8.5 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化程度提高, 职员阶层的竞争力有所下降, 利益相对受损。

(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代际流动变化情况。在武汉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继承率为 53.1%, 向上流动率为 5.6%, 向下流动率为 41.3%。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向下流动率较高与他们本身所处阶层位置有关。在杭州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继承率为 30.3%, 向上流动率为 12.6%, 向上流动率比武汉市提高了 7%, 流出到工人阶层的人数为 10.1%, 比武汉市减少了 5.2%。从较好社会阶层人数占比增加, 以及较差社会阶层人数占比减少这种情况来看,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经济的发展,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受益的。他们在自雇佣者阶层人数分布比例的上升不能单纯理解为向下流动, 更多的是职业价值观的改变。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人们对金钱的重视程度较高, 职业是否赚钱成为人们社会流动的内在驱动力。

(5) 干部阶层的代际流动变化情况。在武汉市, 干部阶层的继承率为 17.3%, 在杭州市这一数字上升为 20.7%; 在武汉市干部子女从事工人职业的人数占比为 20.8%, 在杭州市这一数字下降为